

我即语文

我确是解释过《我即语文》乃是我对语文教师职业素质的自我期许和终生追求。

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不应该只是一个勤于教书、能够教好书的指导者，还应该是一个既能体验语文又能体现语文的实践者。除了语文课堂，他还应该有自己的“一块语史小天地”，躬身其中，亲知甘苦，自得其乐。

他既要明语文育人，更要以语文修身。他应该让学生从他身上，看到学到许多更亲切更生动的语文。

身教重于言传，是被我视为语文教育的三个重要特征之一。

陈日亮

福建教育出版社

我即语文

陈日亮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即语文/陈日亮.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34-4651-2

I. 我… II. 陈…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231 号

我即语文

陈日亮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6971 83725592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闽侯青圃印刷厂印刷

(闽侯青口镇 邮编: 3501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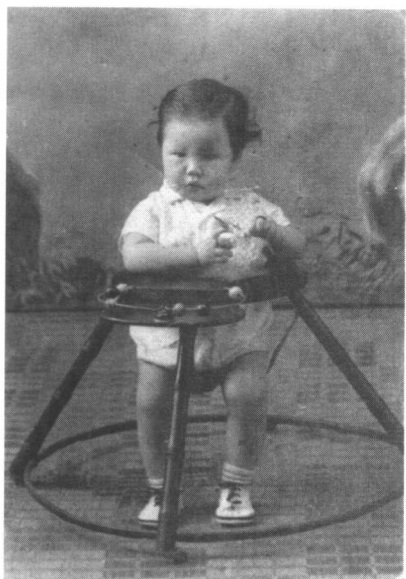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31.5 印张 469 千字 6 插页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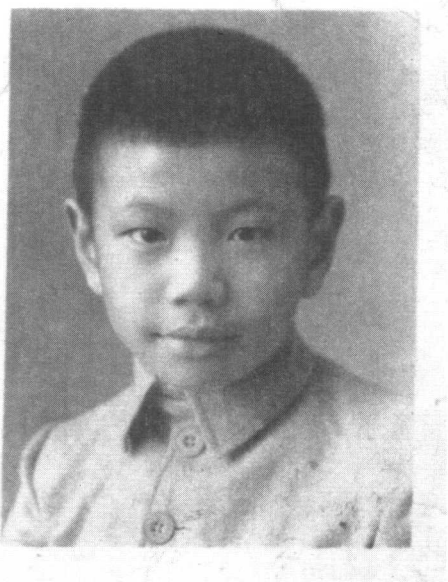
印数: 1—5 100

ISBN 978-7-5334-4651-2 定价: 3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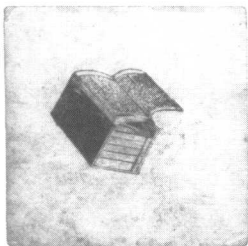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我识字比别的孩子都早，几乎与牙牙学语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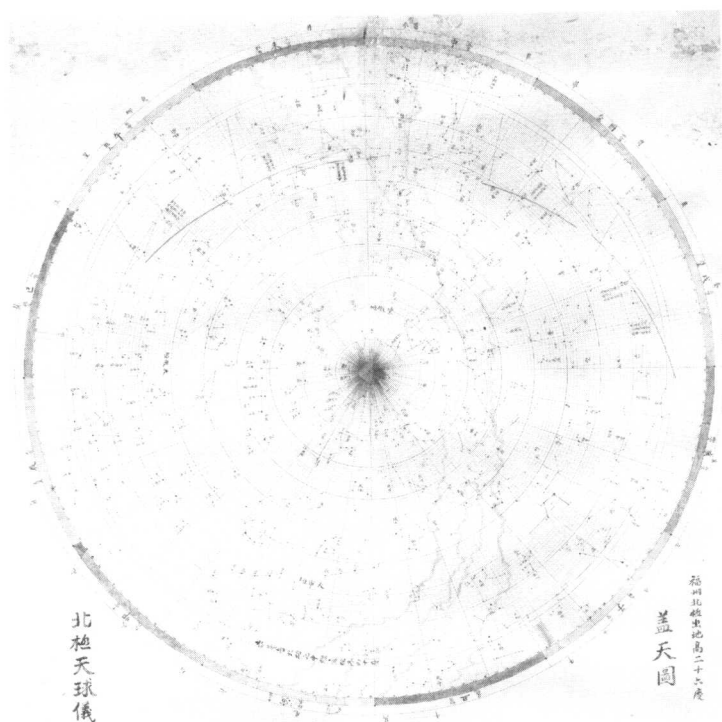
八岁在上海虹池小学读三年级，校园就在今天虹口公园的鲁迅纪念馆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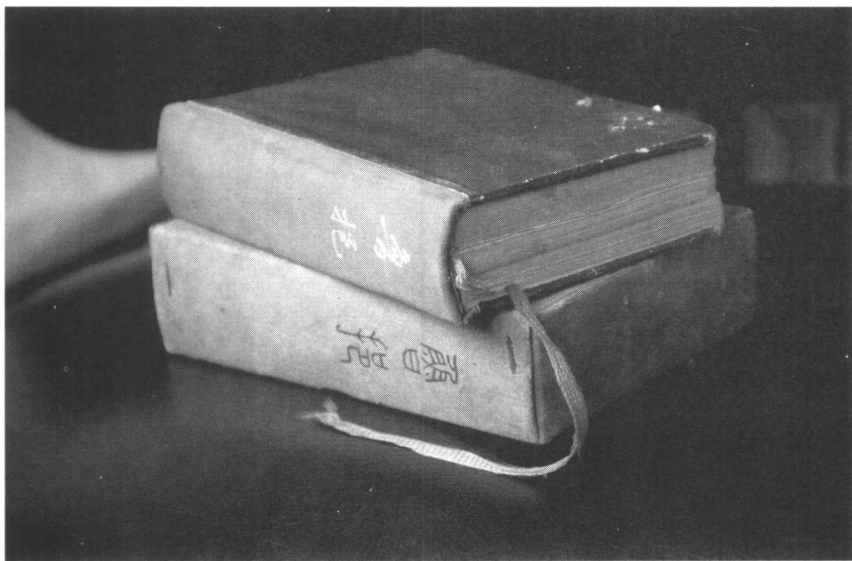
一千多张字片竟在“文革”劫灰中保存下来，可见启蒙灵物，运动的邪火也怕它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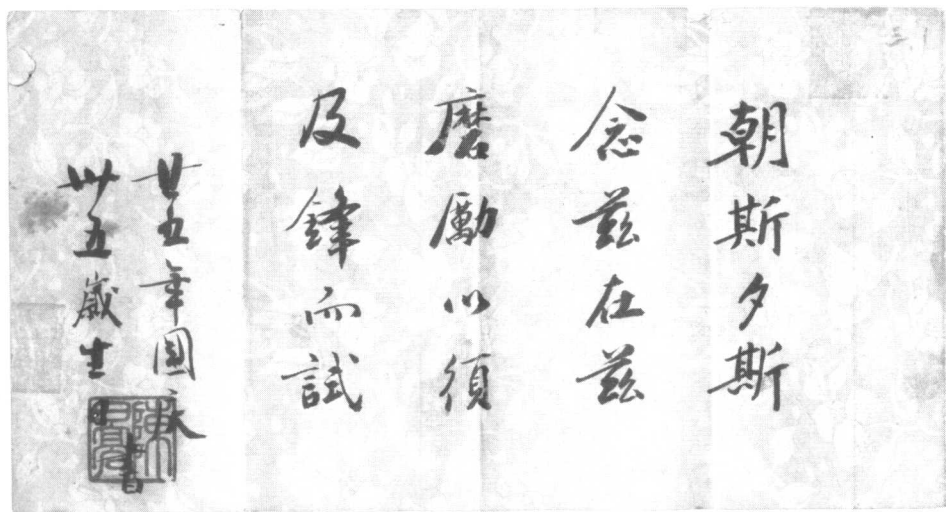
祖父缁衣打坐。他心境澄明，意态执著，影响了我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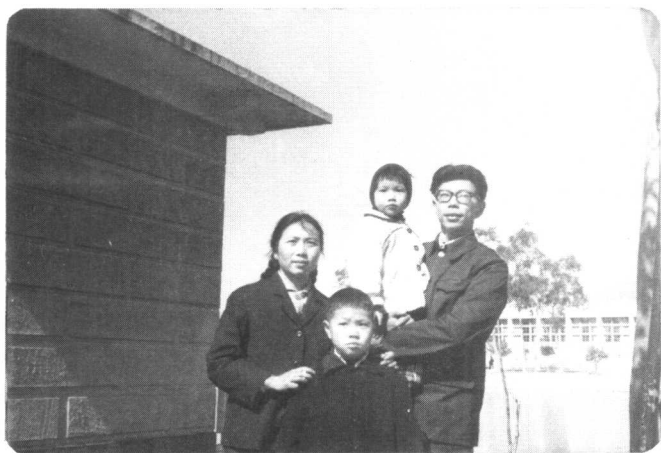
神清若水，心细如发。祖父用极普通的制图仪器画出如此精确的天文图。



1970 自作《鲁挹》：在荒寒岁月里追随一个伟大灵魂的记录。



1974：当年它就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我每日都要无数次肃然面对。



教负家累，双肩荷重。但是，教育的春天毕竟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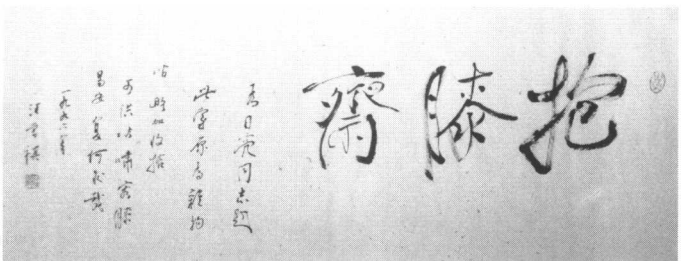
陋室伏案，为夺回十年损失。



1986年拜访叶圣陶先生，亲聆馨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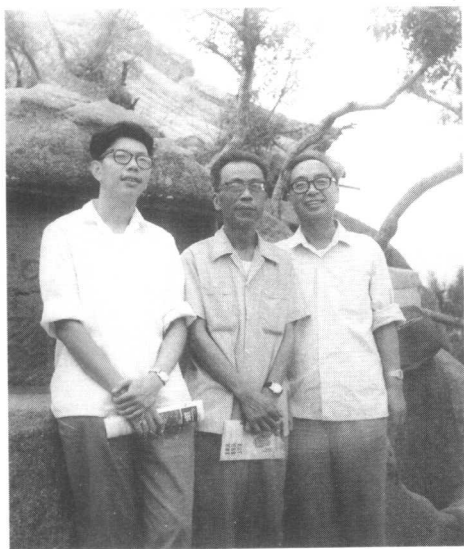


1994年趋访汪曾祺先生，近接春温。



汪曾祺先生为我杂物间改造的书房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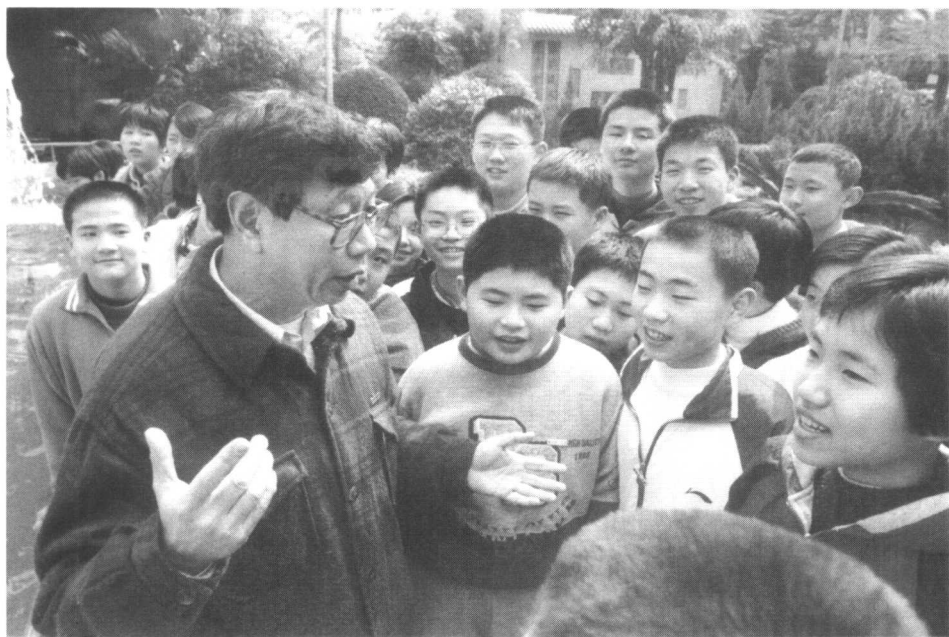
高中，薛来弼老师带我们走进了文学的世界。



教改起步：1980年夏，随同程力夫、虞韶年二位前辈出席全国中语会北戴河座谈会。



“语文教师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够’字。”于漪老师的话先得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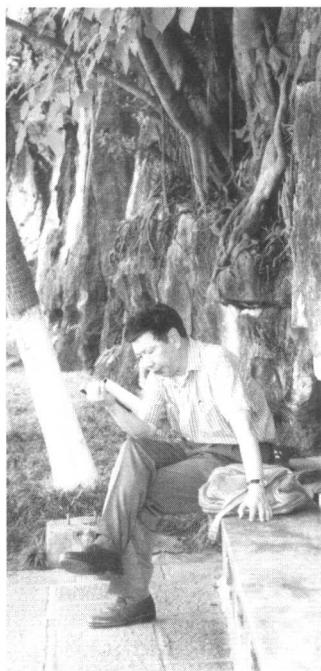


学生的张张笑脸，教师的一生春色。

只要有書可讀別無
營求

楊仲誠校長書
俯仰齋主人書
李景禧書

书房里的这个条幅，
也是主人的自我期许和
追求。



旅游休憩片刻，读几页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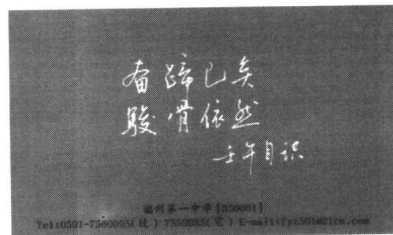
为《教师法》鼓与呼。



多年师生成兄弟。和董琨、李军在福州一中校园。



2002年在朝鲜，我们俩都喜欢身后那两股清丽的喷泉。



每到新春，祝已贺人，聊以遣兴。

“以心契心”的交流，弥足珍贵的“个案”

——陈日亮《我即语文》序

钱理群

一、释 题

陈日亮老师希望我为他的语文教育论集写序，我欣然应命，在给陈老师的邮件中说：“从私来说，这是相互支持，从公而言，这也是推动语文教育改革和教学的需要”。

我和陈日亮老师是同龄人。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情景，留在记忆里的是一见如故的那份温情暖意。我最初把它归结为我们共同的对语文教育的痴迷，以及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执著。在这一方面，我对陈日亮老师，还有孙绍振先生和福建中学语文教育界的朋友，确有“相濡以沫”之感，并且永远心存感激。但直到这一次仔细拜读陈老师文章，才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联结：对鲁迅传统的倾心与自觉追随。因此，对陈老师的“语文之路”，我是有话可说的。

我还注意到陈老师在“一次语文课改的访谈”中发表的一个意见：中国语文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需要一次“新一轮的反思”，“关于语文教学效益这一沉重话题的深层思考”，以为“教改迟早要遭遇攻坚战和持久战”，要进行“更周密的思想准备”（《语文教臆（下）》）。这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抓住了深化语文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而且他还提出了方法，就是“从坐而论道的太平交椅，站起来，走下去”，“走到‘个案’中去”，研究学生“学习语文”的个案，

和教师“教语文”的个案，“尽量多占有材料，多用归纳法”，从中“发现机理，穷究本然，找到真正解决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的根本方法”（《退一步，走下去》）。这也切实可行，然而又是“知易行难”。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陈老师此书出版之机，将其作为一个个案，加以研究、总结，切切实实地走出“第一步”呢？听说福州一中和福建省语文学会都有对陈日亮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进行学术研讨的计划，那么，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在我看来，这是推动语文教育改革，形成与发展“闽派语文”的重要举措。作为一个站在门外，而又关心语文教育改革的大学老师，一个自命的“闽派之友”，我是应该加入到讨论中，发表点意见的。陈老师说得很好：这样的讨论，应该与语文教学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既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这门课程”，又能“从一个较远的距离思索这门课程”（《断想》）。

因此，对我来说，写这篇序言，既是“以心契心”的交流，又是关于语文教育的个案研究。——以上，算是“释题”。

二、“我即语文”

“我即语文”是本书的题目，也是陈老师语文教育理念的核心。

首先要关注的自然是“我”：“我”走了怎样一条“语文——人生之路”，“我”和“语文”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正应该是我们讨论的起点。我和陈老师共同的学生姚丹（她是陈老师福州一中的学生，也是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对我说，她读陈老师这本书是从《语文流年》这一类记述性文字读起，并且对在“文革”中陈老师和他的学生的通信最感兴趣。这是应该这么读的：识其“语文教育”，先要识其“语文经验”。

而对我来说，识其“语文经验”，就是重读自己。

读书、写作于我们：抵御压力和诱惑，修身养性

两个人的历史竟是这样的相似：我们都是当年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陈老师在“文革”中检查他的人生观是：“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我的人生观检查之一》）；而我则在“红专辩论”中，检讨自己的理想是：“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一支笔。”简单说来，我们无非是以“读书”、“写作”的文人生活作为自己的人生追

求而已。而这样的追求，正是陈老师后来提出以读书、写作为主要内容的“语文”是一种“人生行为，生命行为”的最初依据。尽管因为这样的追求，受到了批判和压制，但这依然成了我们最后的，唯一的坚守：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弃读书和写作，都不离开语文活动——即使“文革”时期陈老师被下放农村，我在被追捕的流亡途中；直到今天，在经济诱惑和浮躁、浮华世风影响下，“老爷、少爷都不读书，不动笔”的时候，我们却人越老，越是眼不离书，手不离笔。由此形成了我们的“语文”理解：读书、写作，语文活动。对外，它是抵御一切压力和诱惑的精神支柱；对内，它是自我生命发展的需要，是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依托。

这是确乎如此的：我每遇到生存和精神危机，都是回到“语文”，依靠闭门读书和写作来自救与自赎，以达到精神的升华的。而陈老师则强调读书和写作所达到的生命境界：他终身不忘的是，他的祖父“神专目注，一笔不苟”写字的情景，他从中感受到的是“心境澄明，意态执著”的生命状态，以及“身教的力量”。他在祖父的遗泽上，这样写道：“神清若水，心细如发；以此修身，可以致贤；以此治学，可以成家。”（《我的语文流年》）每一个蒙受过陈老师的教泽的学生，接触过陈老师的同事、朋友，大概都会在陈老师的身上，特别是在他的教学活动中，发现这样一种“心境澄明，意态执著”、“神清若水，心细如发”的生命状态和身教的力量，他的教学魅力也实在于此。这不仅是一种家传，恐怕更是他一生的读书、写作，坚持“以语文修身养性”的结果。他所谓“我即语文”，强调的其实是语文与人一生健全发展的关系，通过语文活动达到的生命大境界。

鲁迅于我们：文心和文胆

而且我和陈老师又共同地通过读书与写作结识了鲁迅：这是我们“人生——语文之路”上的重大事件，它几乎决定了我们一生。如陈老师所说，“无论是读书还是教书，是观人还是察事，我这一生都默然深受鲁迅的影响”（《我的语文流年》）。不了解、不抓住这一点，恐怕就很难理解陈老师和我，以及我们这一辈许多人的语文教育观念和实践。

而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是：陈老师是在初中语文课上通过老师的朗

读与鲁迅相遇的。陈老师说，这是他“心中一种神圣的忆念”：在老师放情诵读《故乡》的那一刻，他感到了“从作家文字的深厚内涵和独特形式散发出来”的“经典的魅力”，而且这是“通过声音传送”的，因而“直达心灵”（《我的语文流年》）。——今天，我们不难发现，陈老师的一些重要的语文教育理念，比如强调“经典阅读”，提倡要“占据制高点”，拥有“自己的阅读欣赏的偶像”（《半月鸿（十）》），突出“诵读”在阅读教育中的作用，或许也就在“这一刻”萌芽了。而我则发现，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这样相似：我也从自己的阅读和讲授鲁迅的经验中，总结出了这样的教学法：“讲鲁迅作品，最主要的是读，靠读来进入情境，靠读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的‘入门’的通道。”（《与鲁迅相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陈老师所强调的，他的“言语生命”和“鲁迅的文格、文体、文风”的“灵犀相通”的关系（《我的语文流年》）。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点我们也很相近：陈老师在“文革”中抄录了一本《鲁挹》，自称“私家书”，“在劫难中追随一个伟大灵魂的文字实录”（《我有一本书叫〈鲁挹〉》）；我也抄了几大本，而且珍藏至今。“文革”中我还写了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笔记，以手抄本的形式，编成《向鲁迅学习》一书；陈老师也有研究“鲁迅文风”的计划，并在和学生的通信中提出了初步思路。今天我有幸读到当年的设想，依然为其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独到而惊叹不已。比如说，陈老师在信中指出：“《集外集·序言》的最末一段，是研究鲁迅风格的最要紧的文字，说也奇怪，竟很少有人提及”（《致董琨（三）》），问题是直到今天，也就是说，时隔三十多年后，依然无人提及，这就不仅是“奇怪”，而且令我们这些专业的鲁迅研究者“汗颜”了。而陈老师当年就注意到鲁迅为人为文的“严酷”和“通脱”两面，及其和魏晋文人、文风的关系，并引述了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王瑶先生的意见（《致董琨（三）》）。而我直到本世纪初写《与鲁迅相遇》和《鲁迅作品十五讲》时才来处理这一学术课题，也是相差了三十年。我不禁想到，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历史转折时刻，如果陈老师也和我一样，

走上鲁迅研究的道路，那么，我或许会有一个杰出的同道。但陈老师坚守在教育岗位上，中学语文界因此有了一位深知鲁迅的，学者型的语文教师，确也是大幸。而且当我晚年回眸中学语文，又得以和陈老师相遇，这或许正是“命运之神”的巧妙安排。——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不多说了。

而陈老师对鲁迅的关注，始终是鲁迅之“文”。如上文所引，“第一次”引起他灵魂震撼的，就是鲁迅“文字的深厚内涵和独特形式”。而引发他研究鲁迅的冲动的，也是鲁迅的“文风”。他在“文革”通信中，这样写道：“我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与其说是出自鲁迅思想锋芒与艺术力量的激触，毋宁说是由于现实的学风、文风的刺戟。多年来的耳濡目染，对于时文中种种弊端之痛心疾首，有使自己不能已于言者，遂不自量力地想试它一试，纵于拯溺挽颓无些微之助，也可以破破愁闷的。”（《致董琨（二）》）——我读到这里，立刻想起收入本书，写于2005年的《呼唤严谨求实的语文学风》一文，也是为语文学风的弊端而“痛心疾首”，“愁闷”不已。对于陈老师，为学风纠偏扶正，正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因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抓住不放。从这一角度看，陈老师对鲁迅之“文”，他的文字、文体、文风的关注，显示的是一种“语文”的眼光。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或有不同：我是更关注鲁迅的“心灵”、“思想”的。但如下文所要强调，“文字”与“心灵”、“思想”是不能分离的；因此，我在近年的研究中，也在关注鲁迅的语言和文体（“文风”问题倒没有专门研究），并且十分重视文本细读。看来我们的“鲁迅视野”是各有侧重又在根本上一致而趋同。

实际上，陈老师的“语文鲁迅”的背后，是一个他后来所说的“大化语文”的观念。这也是在“文革”中初见端倪，并在其“文革”通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而精彩的阐述——

当今之世，与其伏在牖下用功，躲进斗室偷安，实不如举步在风沙扑面的途路中，看看世人之种种面目手段，乃是现时代最紧要之学问文章。鲁迅曾指出：“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学的书活起来。”我过去读的书也颇不少，但于理解社会何有哉！真是隔膜得很，迂阔得很。这一看法的改变，也许将成为自己一生的重要的转换点，这些年

来，自感思想渐转向敏锐，头脑已不复成为他人意识的跑马场。年齿虽未至四十，而察人辨事，多有不惑，读书评文，亦颇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不轻于可否而翕然相从也。这个小小进步，曾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致董琨（一）》）

这一段话，或有“文革”时代的烙印，但却对我们理解陈老师其人，特别是后来他所形成的语文观，都很重要，不可轻轻放过。

首先，我们由此而知道，陈老师不是“躲进斗室偷安”的庸人，而是有大关怀，大承担，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一个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绝“不轻于可否而翕然相从”的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坚守、思考、实践，都是出于这样的大关怀、大承担，这样的独立、自主性；因此，他的“语文”关怀，“语文”理念，是以他的信仰、信念为支撑的，可以说是他的信仰、信念的表现，甚至可以说，“语文”即是他的“信仰”、“信念”：这正是“我即语文”的深层含义所在。如果只看到陈老师的儒雅、慎言，看不到他骨子里的血性，他的“脊梁”；如果只就“语文”谈“语文”，看不到他的语文背后的大关怀、大承担，都不免是隔膜的。

我们说“语文”即是陈老师的“信仰”、“信念”，还因为他把自己的信仰、信念，化作了自己独特的语文观念。具体地说，就是他所提出的“文心”和“大化语文”的观念。我们在下文还会有更具体的讨论，这里，只在本节“鲁迅于我们”的讨论范围内，略作说明。

在我看来，“文心”概念的提出，正是提醒人们注意“文”（语言文字）中之“心”（心灵，情感，思想）。我们在前文中说到陈老师关注鲁迅其“文”，其实他更深知，“文”从“心”出，因此，他读鲁迅，也是读其“文”而识其“心”，进而学其“文心”，并借以滋养自己的“文心”。他说自己最后“读书评文，亦颇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这“自放眼光，自树脊梁”八个字，实为鲁迅“文心”之神髓，陈老师已经将其内化了。因此，他后来以“文心”作为他的语文观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实是以己推人，将自己读鲁迅而获得的“读书评文”的理念、标准推之于语文教学，期待年轻一代“读文”而识“心”、育“心”，“自放眼光，自树脊梁”，“作文”因此而有“心”有